

分裂式“是”字句预设穷尽性的实证研究

复旦大学 刘莹 马里兰大学(美国) 杨雨岸

提要:分裂结构可以表达穷尽义,而这种穷尽义的属性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和难点。主要观点可以分为语义和语用两大阵营,细化为断言说、预设说和会话隐含说三类分析。本文以汉语分裂式“是”字句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语义学的测试方法,对比普通话母语者对分裂式“是”字句和其它几类表达穷尽义的结构的理解,以检验上述三类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断言说和会话隐含说,将“是”字句的穷尽义处理为预设更符合母语者语感和语言事实。与 Zimmermann et al. (2020) 的研究发现相比,汉语分裂式“是”字句的穷尽性与匈牙利语分裂句相似,但强于法语、英语和德语分裂句。研究结果为“是”字句更精细的语义分析提供了实证基础,也为分裂句语义的类型学研究增添了新的例证。

关键词:分裂结构;“是”字句;穷尽性;预设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05(2021)05-0669-12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Presupposed Exhaustivity of Mandarin *shi* Clefts

LIU Ying Fuan University

YANG Yu'a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U.S.A.

Abstract: Cleft constructions can express exhaustive inference. The exact status of this inference, however, is still under hot debate. Two accounts have been provided to address this issue. On the semantic account, exhaustive inference is treated as either an assertion or part of the presupposition, whereas on the pragmatic account, it is taken as a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s to test the two accounts by examining how Mandarin *shi* clefts encode exhaustivity using a variation of the covered-box design. It is found that (1) exhaustivity of *shi* clefts is conveyed neither as an assertion nor a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but as part of the presuppositional content; and (2)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from Zimmermann et al. (2020), exhaustivity of Mandarin *shi* clefts resembles that of Hungarian clefts but differs from that of clefts in French, English and German. This study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a more precise semantic analysis of Mandarin *shi* clefts but also offers new data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emantics of clefts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cleft construction; *shi* sentence; exhaustivity; presupposition

1. 引言

分裂结构,如英语的 *it-cleft* (见例 1a)、德语的 *es-cleft* (见例 1b)、法语的 *c'est-cleft* (见例 1c)等,可以表达穷尽性的语义。这里,穷尽性可以简单理解为除了焦点外,其他的候选项不能使谓词为真。根据 É. Kiss (1998),我们可以将穷尽性定义为一个特征,一个焦点句如果是[+穷尽性],则焦点会对其候选项集合 (alternative set)的成员进行穷尽性筛选识别,反之则为[-穷尽性]。

(1) a. **It** was Fred she invited.

→ Besides Fred, she invited no one else. (Büring & Križ 2013)

b. **Es** ist Max, der einen Cocktail gemischt hat. (德语)

It is Max who a cocktail mixed has

It is Max who mixed a cocktail.

→ No one except Max mixed a cocktail. (De Veugh-Geiss et al. 2018)

c. **C'est** Louis qui parle Russe. (法语)

It-is Louis who speaks Russian.

It's Louis who speaks Russian.

→ Besides Louis, on one else speaks Russian. (Destruel et al. 2017)

现代汉语分裂式“是”字句¹(见例 2,后简称“是”字句)也同样具有穷尽性(参见袁毓林 2003 等)。从例(2)中,我们可以推导出“除了张三,其他人没有打李四”的意义。“是”字句具有穷尽性也体现在其不可以与添加算子“也”共现,如例(3)。这是因为“是”的穷尽性要求除了张三,其他人没有打李四,而“也”的添加性语义则要求除了张三,还有其他人打了李四,两者存在直接冲突。

(2) 是[张三]_F打了李四。(分裂式“是”字句)

→ 除了张三,其他人没有打李四。

(3) #是[张三]_F打了李四,王五也打了李四。

然而,使用如(2)和(3)这样的诊断性测试在解决“是”字句穷尽性的属性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基于个体语感的诊断测试很难准确地告诉我们这种穷尽性来自于语义还是语用层面,是预设还是断言,是会话隐含还是规约隐含(参见 4.2 节的讨论),而回答这一问题是实现对“是”字句语义精细刻画的前提。第二,我们很难直接使用诊断性测试所得到的结论去进行跨语言对比。

因此,本文在形式语义学,特别是多维度语义模型(multi-dimensional semantics, Potts 2015 等)的框架下,采用实验语义学的检验方法,尝试回答两个问

¹ 本文只讨论狭义上的焦点类“是”字句,即与“是……的”结构对应,可以标记对比焦点的“是”字句。表示“系表”关系的“是”字句,如例(1)中的句子,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1) a. 张三是老师。(谓词性系动词句)

b. 美国的总统是特朗普。(识别性系动词句)

题:第一,“是”字句的穷尽义存在于语义层面还是语用层面?它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什么,是断言、预设还是会话隐含?第二,从跨语言的角度看,“是”字句的穷尽性又体现出哪些共性和特点?

2. 研究基础

分裂句穷尽性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既有文献的讨论可以划归为两大阵营,主要有三类分析。两大阵营分别为语义阵营和语用阵营。其本质区别在于,如果认定穷尽义为分裂句语义的一部分,则表明穷尽义来自于分裂句结构本身,所有的分裂句都应该有穷尽义。反之,如果认定穷尽义为语用的一部分,则表明其来自于语境和语言的使用。分裂句允许非穷尽的解读,且由于语境等差别,不同分裂句的穷尽性可以有强有弱。

三大分析则分别为断言说(É. Kiss 1998; Lee 2005 等)、预设说(Percus 1997; Büring & Križ 2013 等)和会话隐含说(Horn 1981, 2016 等)。三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根据断言说,穷尽性是分裂句的语义核心,是新信息,直接决定分裂句的真值;根据预设说,穷尽性是会话双方的已知信息,是分裂句得以使用的先决条件;而会话隐含说则认为分裂句本身不表达穷尽性,穷尽性是在语境中通过会话原则产生的语用推理,穷尽性可以被取消。表1简单概括了文献中对于分裂句穷尽性的分析以及这些分析所预测的穷尽性应该有的语言表现。

表1 三类分析及其主要预测

两大阵营	三类分析	分析的预测		
语义	断言说	(i)分裂句都有穷尽性	(ii)内部同质	(iii)影响真值
	预设说	(i)分裂句都有穷尽性	(ii)内部同质	(iii)影响适宜性
语用	会话隐含说	(i)允许非穷尽解读	(ii)内部多样	(iii)可取消性

为了进一步探究穷尽义的来源和实质,近年来,一系列针对分裂句穷尽性的实证性研究应运而生(De Veugh-Geiss et al. 2015; Destruel et al. 2017; Destruel & De Veugh-Geiss 2018; Pintér 2018; Zimmermann et al. 2020 等)。其中, Zimmermann et al. (2020) 采用了鼠标追踪范式下的图文识别任务(mouse-driven picture-verification task)的测试形式,检测了母语者对限定性小品词句(i)、分裂句(ii)、定指性准分裂句(iii)以及一般焦点句(iv)四类句型穷尽性的解读情况。同时,他们对比了英语、德语、法语、匈牙利语四种不同语言的受试对于各自语言中分裂句穷尽性的解读情况。结果发现,几类语言间分裂句穷尽性的解读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对于除法语外的三种语言,受试对分裂句进行穷尽性解读的比率低于限定性小品词句,高于一般焦点句,而与定指性准分裂句相同。另一方面,

分裂句的穷尽性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跨语言差异。匈牙利语中分裂句获得穷尽性解读的比例最高,受试在解读穷尽性时未体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穷尽性的解读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的特点。德语和英语较为相似,受试间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穷尽性的解读不具有同质性。有的受试对分裂句一致进行穷尽性解读,有的则一致进行非穷尽性解读。法语中分裂句的穷尽性则显著偏低,分裂句的穷尽性要明显弱于定指性准分裂句。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可以根据母语者对穷尽性的解读将分裂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匈牙利语为代表,其特点为分裂句的穷尽性与定指性准分裂句的最大化预设解读相似,且具有内部一致性,不存在受试间的个体差异。第二类以德语和英语为代表,这些语言中分裂句穷尽性虽然与定指性准分裂句的最大化预设解读相似,但分裂句内部不具有 consistency,存在受试间的解读差异。第三类则以法语为代表,母语者对于分裂句穷尽性的解读显著弱于准分裂句。那么,汉语“是”字句又属于哪一类呢?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是”字句的穷尽性又体现出哪些共性和哪些特点呢?

3. “是”字句穷尽性的实证研究

相较于国际上的热烈讨论,对于汉语“是”字句穷尽性的研究,特别是实证性的研究则要少很多。接下来,我们汇报一项针对“是”字句穷尽性的实证性研究。

3.1 实验设计

实验采取了带有被遮挡图片的图文配对任务(sentence-picture verification task using covered-box paradigm; 详见 Huang et al. 2013 等对于该方法的讨论)。基本的设计思路为,向受试展示一句测试句和两幅图片。其中,一幅可以看到实际图片,另一幅则被黑布完全遮挡。两幅图中有且只有一幅完全符合测试句的描述。受试需要在两幅图中做出选择。

实验中,每一个测试情境均由一个背景介绍页面和一个测试页面组成。背景介绍页面向受试提前展示测试中涉及的对话背景和人物,以避免受试因为对情境的不同理解而对测试句进行误判。受试看过背景介绍页面之后可点击“继续”键进入测试页面。受试会首先读到一句导言,其形式为一个存在性的表述,“xx 当中,有人……”。接下来,受试会听到一句由语音形式呈现的测试句²。测试句播放完毕后,屏幕上自动呈现两张图片,一张没有被遮盖,而另一张则完全被黑布遮挡。受试需在两张图片中根据自己的语感做出选择。具体示例参见表2。

²导言句的意义在于明确穷尽性解读的限定域,确保“是”字句使用的适宜性。将测试句设置为语音形式则是为了避免由于“是”字句焦点不同和焦点的投射问题(focus projection)造成的解读上的歧义。

表2 实验测试项和相应图片示例

<p>背景 页面</p>		
<p>测试 页面</p>		
<p>语音 刺激</p>	<p>“是”字句</p>	<p>是[小灰猫]_F钓到了鱼。</p>
<p>准分裂句</p>	<p>钓到了鱼的是[小灰猫]_F。</p>	<p>谁钓到了鱼呀? - [小灰猫]_F钓到了鱼。</p>
<p>一般性焦点句</p>	<p>只有[小灰猫]_F钓到了鱼。</p>	
<p>“只有”句</p>		

实验中,未被遮盖的图片除违反穷尽性以外,满足测试句的其他全部语义。因此,如果受试选择了未被遮盖的图片,表明受试在理解该测试句的时候并没有考量其穷尽性;而如果受试选择了被遮盖的图片则表明受试对该测试句的解读具有穷尽性。换言之,受试选择被遮挡图片的比例即为对测试句进行穷尽性解读的比例。

实验选取了“只有”句、“是”字句、准分裂句和由特殊疑问句标记的一般性焦点句四类测试句型。相应的例句及图片见表2。四类测试句的焦点成分一致,所配图片和语境也完全一致。

选择测试“只有”句的原因有二。首先,“只有”句可视为断言穷尽义的基准线。假如“是”字句的穷尽义为断言,如 Lee (2005)等的分析,则它的逻辑语义与“只有”的逻辑语义完全一致,母语者对两类句型的解读也应该一致。因此,对比母语者对“是”字句和“只有”句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是”字句的穷尽性是否为断言。其次,鉴于穷尽性为“只有”的核心语义,检测受试对于“只有”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检查实验的信度与效度。

同 Zimmermann et al. (2020)等多项研究相似,我们同时测试了母语者对于准分裂句³的理解。原因有两点:首先,我们将准分裂句定为预设穷尽义的基准线,通过对比“是”字句和准分裂句,我们可以检验“是”字句的穷尽性是否为预设。其次,对比母语者对这两类结构的解读方便我们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跨语言的对比。

我们选取的第四类测试句是由问答对标记的一般性焦点句。我们将这一结构处理为会话隐含穷尽性的基准线。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既有文献选择测试重音标记的一般性焦点句不同,为了排除存在性预设和焦点的投射效应对穷尽性造成的干扰(详见 Zimmermann & Onea 2011; De Veugh-Geiss et al. 2015; Horn 2016),我们选择对比“是”字句与特殊疑问句标记的一般性焦点句。由特殊疑问句标记的焦点句具有同“是”字句一样的存在性预设,同时,它又具有一个显性的待解决问题,因此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这一问题。

实验共设立了 12 组测试项,每组包含四种测试句型各一句,共有 48 个测试句(12×4)。这 48 个测试句被以拉丁方的方式平均分配到四组。除了 12 个测试句外,按照 1:2 的比例,每组插入了 24 个填充项。填充项的类型为:1) 全称量化“所有 A”配以满足“所有 A”的图片;2) 梯级算子“有些 A”配以“有些但并非全部 A”或“全部 A”的图片;3) 合取式“A 和 B”配以“只有 A”的图片;4) “是”字句配以满足其穷尽义的图片⁴。每组的 36 个句子被再次随机打乱,以保证不存在两个相邻的测试句。为了保证受试充分理解我们的测试任务,实验前我们插入了 1 个例句和 4 个训练项(practice trial)。对于例句和训练项,受试做出选择后可以看到原先被遮挡住的图片和一些简单的说明。而在正式的测试中,受试选择后,被遮挡的图片不会显现。

48 位普通话母语者完成了此项测试。其中,女性 34 人,男性 14 人。他们的年龄分布在 23 到 5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8.1 岁。所有受试均在日常生活中以普通话为主要交际语言。其中,两位被试来自于普通话和北方方言以外的方言

³ 我们认为,汉语中准分裂句例(II)b,在语义上与定指性准分裂句(II)a 等值;(II)b 可视为(II)a 省略了名词中心语的形式(参见 Cheng 2008 等)。实验采用准分裂句而不是定指性准分裂句的原因在于预实验中,定指性准分裂句的合法性接受度较低。

(II) a. 迟到的人是[张三]_F。 (定指性准分裂句)

b. 迟到的是[张三]_F。 (准分裂句)

⁴ 设置最后一组填充项是为了控制受试因为除穷尽义以外的其他原因而选择被遮挡图片。

区(湘方言区1人、赣方言区1人)。

3.2 实验结果

实验中,每位受试针对每一类测试句进行3次判断。实验总计得到144次(48×3)对测试句的判断。四类测试句中受试选择被遮盖图片的百分比分别为“是”字句:77.5%，“只有”句:94.7%，准分裂句:75.5%，一般性焦点句:65.3%。承前所述,选择被遮盖图片的百分比亦可以理解为产生穷尽性解读的百分比。可见,四类结构均具有普通话母语者切实可感的穷尽义。

我们使用了R软件中*lme4*安装包对这一实验结果进行了混合性逻辑斯蒂回归模型⁵(mixed effect logistic regression)检测,其中固定效应为受试的选择结果,随机效应为每个受试的截距和斜率以及每个测试项的截距和斜率。结果显示,受试对于“是”字句穷尽义的接受度与准分裂句无显著差异。然而,“只有”和“是”字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是”字句和一般性焦点句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统计数据参见表3。由此可见,受试对于“是”字句穷尽性的感知和准分裂句相同,但却与另外两种结构不同。较“是”字句而言,受试对于“只有”句的穷尽性具有更好的敏感度,但对一般性焦点句产生穷尽性解读的概率更低。

我们也对“是”字句内部进行了进一步检验,逻辑斯蒂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的结果未检测到受试间的显著个体差异,以受试为固定效应的模型与常量模型相比不具有显著差异($\chi^2=0.17, p=.68$)。这表明,不同受试对“是”字句的解读具有同质性。

表3 “是”字句与三类句型的统计对比(混合性逻辑斯蒂回归)

	β	SE	z	p
“是”vs“只有”	-2.338	0.67	-3.471	.001
“是”vs 准分裂句	-0.024	0.43	0.056	.955
“是”vs 一般焦点句	0.904	0.41	2.194	.028

4. 讨论

对于上述结果,我们将从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跨语言对比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4.1 理论意义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我们发现:首先,“是”字句具有母语者切实可感的穷尽义。这为文献中对“是”字句具有穷尽义的理论论断(Lee 2005; Cheng 2008; Hole 2011; 袁毓林 2003 等)提供了实验支持。

⁵ 实验中使用的模型如下: Experiment: glmer(response~condition+(|| subject)+(|| item), data=experiment, family=binomial).

其次,回到表1,我们发现,我们的实验结果与“预设说”的预测相吻合。“是”字句的穷尽性更应当被分析为一种语义预设。原因在于:1)与“只有”句不同,普通话母语者对于“是”字句进行穷尽性解读的比例显著低于断言穷尽性的“只有”。承前所述,“是”字句和“只有”的语义组成成分相同,但母语者对两类结构穷尽性的感知却不同,这意味着两类结构中,穷尽性所在的维度并不相同。因为我们已经明确“只有”的穷尽性为断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字句的穷尽性并非断言。2)“是”字句的穷尽性与一般性焦点句也存在明显差别;母语者对于“是”字句穷尽性的感知显著高于一般性焦点句;我们已经确定一般焦点句的穷尽性为会话隐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是”字句的穷尽性并非会话隐含。3)“是”字句与定指性准分裂句的穷尽性解读相同。而由于定指性准分裂句的穷尽性来源于其唯一性预设,“是”字句的穷尽性也属于预设。4)受试对于“是”字句穷尽性的解读未体现出显著的个体间差异,而具有同一性的属性。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是”字句穷尽性来自于“是”字句的语义而非语用。综合这四项证据,我们得出结论——“是”字句预设穷尽性。

弄清“是”字句的穷尽性来自于语义还是语用,是断言、预设还是一种会话隐含是对“是”字句的语义进行形式化描写的基础。上述实验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检验既有文献对于“是”字句的几种语义分析。Paul & Whitman (2008)和 Cheng (2008)等虽然观察到“是”字句具有穷尽性,但对于穷尽性的属性并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Lee (2005)将“是”字句和“只有”句的语义做了等同的处理,而这并不符合母语者对于两类结构的感知。Hole (2011)虽然正确判断了分裂句穷尽性的预设属性,但他将“是……的”句句尾的“的”处理为穷尽性算子,这一处理方法无法解释没有“的”的“是”字句为什么同样具有穷尽性。而我们的实验结果与刘莹、李宝伦 (2019)提出的基于预设对比性的“是”字句语义分析相吻合。基于本文的实证性性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此不多做赘述。关于“是”字句的语义分析可参见刘莹、李宝伦 (2019)。

4.2 方法论意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分裂句穷尽性的属性判定之所以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原因之一在于传统的诊断测试对这一问题较难直接做出清晰有效的判定。根据 Karttunen (1973)等研究,预设的标准检验方法是观察其在投射语境下 (projective contexts) 的表现。情态句和条件句前件为预设的通道 (holes), 在这些语境下预设性成分不会被取消。然而,如果将“是”字句的穷尽性放入这两种语境,我们的语感似乎很难得到清晰一致的判定。举例来看,假设“是”字句的穷尽性是预设,则例(4)中前件信息“有三个人迟到了”和“是”字句的穷尽性“除了张三,其他人没有迟到”有语义冲突,例(4)两句应该不能说。然而,这两句话的接受度似乎很难判断,存在一定的因人而异,因语境而异的情况。就个人语感而

言,我们认为(4b)较(4a)而言,似乎接受度更高。由此可见,我们很难依据通道语境来直接判断“是”字句穷尽义是否为预设。而实验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在这一实验中,我们采用了将“是”字句穷尽性和典型的断言、预设、会话隐含穷尽性的结构进行对比的方法,从而避开了使用投射语境可能造成的上述问题。

(4) 情境:公司在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会议。HR发现有3位同事迟到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谁。HR说:

a. ?有三个人迟到了,可能是张三迟到了。

b. ?有三个人迟到了,如果是张三迟到了,老板一定会很生气。

就实验设计而言,实验采用了带有被遮挡图片的图文配对任务这一测试形式。相较于传统的真值判断任务(truth value judgement task),其优点在于它对于不直接影响、决定测试句真值的意义成分,如预设,会话隐含、规约隐含等具有更高的敏感度。根据经典逻辑,预设失败不会导致命题为假,而是会造成其没有真值。而会话隐和规约隐含属于语用层面,也不会对命题真值产生决定作用。因此真值判断任务“真”“假”的二元判断标准较难直接捕捉到这种非真值层面的差异。而在我们的范式下,受试只要认为测试句和图片有任何不符均可选择被遮挡图片(详见 Huang et al. 2013 的讨论),具有更高的敏感度。此在,在统计方法上,我们采用了混合性逻辑斯蒂回归的统计模型。较传统的卡方检验等而言,它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包括受试个体差异在内的一些非相关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在本实验中,通过这一模型,我们控制了两组随机变量(random effects),分别为每个受试个体的截距和斜率以及每个测试项的截距和斜率。这进一步削弱了受试和测试项的个体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弥合了受试个人语感和实验整体发现之间的偏差。

4.3 跨语言对比

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分裂句穷尽义属性的界定近年来一直是实验语义学、语用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取得了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等印欧语语料的研究新进展。而本实验以汉语“是”字句为语料,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补充。根据 Zimmermann et al. (2020)等的研究,不同语言中的分裂结构具有共同的语义内核——穷尽性,但穷尽性的具体实现允许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由本实验的结果可见,汉语“是”字句和匈牙利语的分裂结构在穷尽性的表达上高度一致,其受试的解读与定指性准分裂句的最大化预设解读相似,且具有内部一致性,不存在受试间的个体差异。

通过这些跨语言的对比,我们还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从句法的角度来看,汉语“是”字句是否属于分裂结构在文献中存在较大争议,“是”字句与典型的分裂句句法结构相差甚远(Lee 2005; Cheng 2008; Paul & Whitmen

2008; 汤廷池 1983; 黄正德 1989 等)。根据 Lambrecht (2001) 等的研究, 分裂句的核心句法属性在于用一个复句结构表达一个简单命题。然而, 对比例(1)和例(2), 我们不难发现“是”不具有典型分裂句的复句结构, “是”是否可分析为系动词存在较大争议, 且“是”字句焦点不涉及焦点的显性移位, 其标记方式更像是焦点关联(association with focus, 参见 Cheng 2008; Paul & Whitman 2008; Erlewine 2015 等)。但在语义上, “是”字句却与典型的分裂结构高度相似。它的语义同样由存在性预设、识别性断言和穷尽性三部分组成, 且其穷尽性也与典型的印欧语分裂结构的穷尽性高度相似。这一结果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一系列重要且有趣的问题, 比如, 第一, 分裂句应该从句法还是语义角度定义? 如果仅从句法角度界定分裂结构, 势必会缺失汉语“是”字句这一类虽然句法结构不“分裂”但是表义同分裂句高度相似的结构。由本实验及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见, 分裂句中具有跨语言普遍性的似乎不是其“分裂”的句法结构而是其穷尽性的语义内核。第二, 不同语言间是否存在形与义的匹配? 我们一般可以接受不同语言之间, 同样的句法结构表达同样的语义内容, 比如大多数语言都具有“被动句”、“中动句”等句法结构, 且表达的基本语义高度一致。那么, 同样的语义内容在不同语言中是否必须以同样的句法形式实现? 德语、英语、法语、匈牙利语均属于印欧语系, 这些语言中分裂句的句法结构高度相似, 但根据 Zimmermann et al. (2020), 它们语义上穷尽性的表达并不完全相同。而汉语“是”字句和匈牙利语分裂结构在句法上差别甚远, 但在语义上却高度一致。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讨论。

5. 结语

关于“是”字句的语义, 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很少涉及对“是”字句穷尽性的处理。有鉴于此, 本文在实验语义学的框架下, 汇报了一项针对“是”字句穷尽性的实验研究。研究旨在验证三类分裂句穷尽性的既有分析, 以期能找出与普通话母语者语感最吻合的处理。同时, 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是”字句的穷尽性实质上是一种语义预设。第二, 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 “是”字句的穷尽性稍强于法语、德语和英语的分裂结构, 与匈牙利语的分裂结构相同。

本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多维度语义模型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其穷尽性的属性, 细致区分了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 区分了断言、预设和会话隐含三种意义类型, 并将穷尽性的属性锁定在了语义预设上, 这不仅弥补了理论研究讨论的不足, 也为之后更加精细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然而, 本文只是“是”字句语义实验性研究的一个起点, 依旧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与准分裂句解读相同是否一定意味着“是”字句的穷尽性为预设? “是”字句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预设形式?“是”字句和准分裂句在穷尽性表达上完全一致,那么两者的语义差别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最后,简单讨论一下形式化理论分析和实证性研究的关系。形式语言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常常被质疑的一个问题便是语言学家的语感常常会与母语者的真实语感相脱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语言学家们不断进行着新的尝试,比如使用语料库的真实语料代替人工创造的语料等等。而西方近年来兴起的实验语言学也为解决这一难题做出了较好的尝试。理论分析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能够客观反应语言事实,能够符合母语者的真实语感也是语言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实验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否定理论分析,“实验方法对于语义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填补理论分析方法的盲区,实验所提供的手段使得语义和语用的动态关系以及语义组合的内在机制得到更精细的研究”(沈园 2017)。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Büring, D. & M. Križ. 2013. It's that, and that's it! Exhaustivity and homogeneity presuppositions in clefts (and definit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6: 1-29.
- Cheng, L. 2008. Deconstructing the *shi...de*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Review* 25: 235-266.
- De Veugh-Geiss, J., S. Tönnis, E. Onea & M. Zimmermann. 2018. That's not quite it: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non-)exhaustivity in cleft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11(3), Early Access version. DOI: <http://dx.doi.org/10.3765/sp.11.3>
- De Veugh - Geiss, J., M. Zimmermann & E. Onea. 2015. Contradicting (not-)at-issueness in exclusives and clefts: An empirical study. In S. D'Antonio, M. Moroney & C. Little (eds.). *Proceedings of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5, 373-393.
- Destruel, E., D. Beaver & L. Coppock. 2017. Clefts: Quite the contrary! In *Proceedings of Sinn und Bedeutung* 21. Edinburgh: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Destruel, E. & J. Deveugh - Geiss. 2018.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exhaustivity: Evidence of variation in English and French clef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38: 1-16.
- Horn, L. R. 1981. Exhaustiveness and the semantics of clefts. *Proceeding of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11: 125-142.
- É. Kiss, K. 1998. Identificational focus vs. information focus. *Language* 74: 245-273.
- Erlewine, M. Y. 2015. In defense of Closeness: Focus-sensitive adverb placement in Vietnamese and Mandarin Chinese. Manuscript, McGill University.
- Horn, L. R. 2016.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the landscape of (non-)at-issue meaning. In C. Féry & S. Ishihara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8-127.
- Huang, C.-T. J. (黄正德). 1989. On *shi* and *you*. *Bulletin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9): 43-64. [1989, 说“是”和“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9辑: 43-64.]

- Huang, Y., E. Spelke & J. Snedeke. 2013. What exactly do numbers mean? *Lan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9: 105-129.
- Karttunen, L. 1973. Presuppositions of compound sentences. *Linguistic Inquiry* 4: 168-193.
- Lambrech, K. 2001.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left constructions. *Linguistics* 39(3): 463-516.
- Lee, H. 2005. *On Chinese Focus and Cleft Constructions*.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Liu, Ying (刘莹) & Lee, Polun (李宝伦). 2019. Contrastivity or exhaustiv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mantics of Mandarin *shi* sentences and English *it*-cleft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5): 678-689. [2019, 穷尽性还是对比性? ——从英语分裂句看汉语焦点类“是”字句的语义.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 678-689.]
- Paul, W. & J. Whitman. 2008. *Shi...de* focus cleft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 Review* 25: 413-451.
- Percus, O. 1997. Prying open the cleft. *Proceedings of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27: 337-351.
- Pintér, L. 2018. The acquisition of asserted, presupposed, and pragmatically implied exhaustivity in Hungarian. *Acta Linguistica Academica* 65(2): 353-383.
- Potts, C. 2015.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Interacting with grammar. In S. Lappin & C. Fox (eds.).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68-202.
- Shen, Yuan (沈园) 2017. Formal semantics and the experimental approach.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 234-245. [2017, 形式语义学和实验方法. 《当代语言学》第2期: 234-245.]
- Teng, S. 1979. Remarks on the cleft sentenc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1): 101-114.
- Yuan, Yulin (袁毓林) 2003.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unction of *de* in the sentence final position: From a viewpoint of the modern focus theor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 3-16. [2003,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 《中国语文》第1期: 3-16.]
- Zimmermann, M., J. De Veugh-Geiss, S. Tönnis & E. Onea. 2020. (Non-) Exhaustivity in focus partitioning across languages. In V. Hegedüs & I. Vogel (eds.). *Approaches to Hungarian (Vol. 16): Papers from The 2017 Budapest Con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8-230.

收稿日期: 2019-09-20; 作者修改稿, 2020-12-22; 本刊修订, 2021-04-27

通讯作者: 刘莹 <chunhuaxy@hotmail.com>

200433 上海市 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Ying, Institute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 R. China